



平凡的扶輪社員
可能會經歷不平凡的情境。
他們現身說法，
告訴我們…。

插畫：AAD GOUDAPPEL

如何熬過想像不到的情況

葛斯塔夫·賽賓諾 Gustavo Zerbino

烏拉圭蒙特維迪歐 (Montevideo) 扶輪社

飛機墜毀前一刻，我解開安全帶，站起來，抓住艙頂。

飛機撞山，就從我坐的地方裂開來。坐在我隔壁座位的朋友摔出飛機身亡。

我和我的橄欖球隊一起，烏拉圭蒙特維迪歐的老基督徒隊。當時是 1972 年 10 月，我們飛過安地斯山要前往智利的聖地牙哥參加橄欖球比賽。機上有 40 名乘客——隊友以及朋友和眷屬——還有 5 名機組員。我坐在窗戶邊，看著底下的連綿山峰，突然間，山離我好近。我跟坐在走道旁的朋友借過，去跟駕駛講話。他們要我別擔心，可是接著他們往窗外看，看到山峰，就叫我回去坐好。

在墜機後，我心裡想死人會思考果然是真的，因為我不敢相信我還活著。所有的座位都堆疊在一起。到處都是死人、受傷的人，以及掙扎爬出來的人。

我們墜毀在淚水冰河 (Glacier of Tears)。我們沒有食物。夜晚因為下雪又有風，溫度掉到華氏零下 40 度。到了白天，天空晴朗無雲，太陽

直射，十分炎熱。

我們在山區的 72 天有很多事可以說。有數百支紀錄片。還有書和電影《我們要活著回去》(Alive)。

我們很年輕，適應得很快，因為我們沒有選擇。我們身上穿的是我們僅有的衣服：皮鞋、尼龍襪、褲子、襯衫、西裝外套、領帶。有人死了，你會穿上他的褲子，那你就有兩條褲子，或兩雙襪子。

每個晚上，我們都唸玫瑰經祈禱。有三個理由：第一，感謝上帝讓我們在空難後活下來，並懇求再多一個好日子。第二個理由是唸玫瑰經就像有擋風玻璃的雨刷一樣，會掃除我們在夜晚黑暗中所累積的負面思想。而第三個理由是每隔 5 分鐘，玫瑰經就會唸完一遍要重頭來。如果你睡著，可能會凍死變雕像，所以我們會推擠彼此唸經祈禱。

我們用幾台收音機的殘骸組裝成一台可用的，聽到搜救行動已經取消。世界背棄我們，所以我們組成一個聯盟，唯一的目標就是活下去。我們瞭解到人生中最重要不是發

生什麼事，而是我們如何因應所發生的事，這是唯一可以取決於我們的事。

沒有非凡的人。只有普通、平凡的人——像你、像我——能夠做不平凡的事，只要我們連結愛與熱情，只要我們做比我們自己更重要的事。

我們約定好，如果我們死了，我們的朋友可以使用我們的身體，讓他們活下去。我們明白這是合乎邏輯的事。我們的隊友葛斯塔夫·尼科里奇 Gustavo Nicolich 寫了一封信給他母親，我們獲救時我還帶在身上。他告訴她我們開始吃我們朋友屍體的肉。他說我們從內心深處請求上帝不要讓這樣的事發生。可是當這個時候來到時，我們必須用勇氣及信念來面對與接受。

這是讓我們引以為榮的事。我們選擇生，而不是死。我們 16 個人活下來述說我們的故事。

告訴別人我們所發生的事向來不會困擾我。那是我們能夠獻給死在山上的朋友最好的敬意，因為他們都是很棒的人，給了我們一切，所以我們



才能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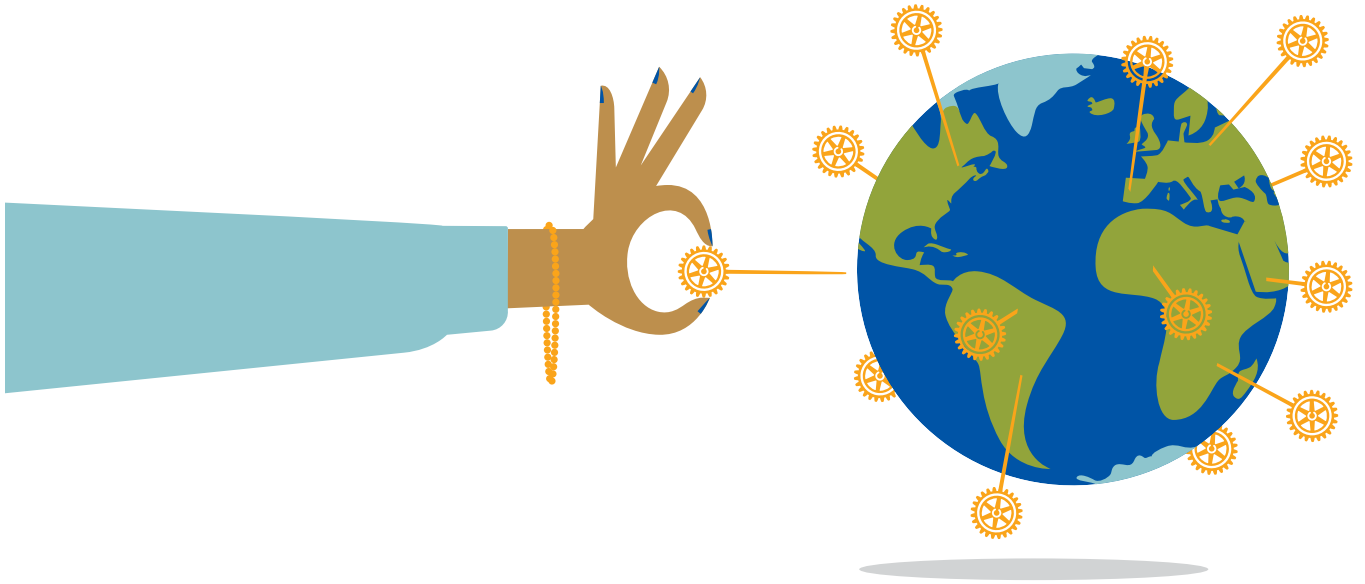
我從沒去想我曾搭乘墜落的飛機。後來我搭機到各地，我照常做事，我不擔心。今天，我是烏拉圭一家跨國製藥公司的董事長。我還隸屬橄欖球聯盟。我曾經打過烏拉圭國家橄欖球隊。我目前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顧問。我參

與一個名為「無國界橄欖球」(Rugby Without Borders) 的基金會。我加入扶輪 23 年了。我有 6 個孩子。我做了許多事。安地斯山的意外只是我所發生的其中一件事而已。

對世界來說，那是一件大事。可是人的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無法重複的。所有你經

歷過的事對你來說都是獨特的。生命對我們很慷慨。它給我機會活、學習、分享，並感謝我活著的每一天。

口述由 **Briscola Greene** 及
Diana Schoberg 整理



拜訪 22 個國家的扶輪社

卡西·阿茲梅里 Kazi Asma Azmery
孟加拉大達卡 (Greater Dhaka) 扶輪社

我現在人在亞塞拜然。這是我自 2009 年以來去過的第 96 個國家；我拜訪過其中 22 個國家的 50 個扶輪社。在我的家鄉孟加拉，成為扶輪社員是莫大的榮耀，因為所有的扶輪社員都是我母親的朋友、父親的朋友、叔叔的朋友。我加入時 26 歲。起初他們不要我加入，因為我太年輕，還穿牛仔褲。我的祖國是個非常保守的回教國家，他們不希望在扶輪這樣穿著打扮。可是我努力建立自己身為現代扶輪社員的角色。

很多次扶輪社的網站資訊不正確。許多次在許多國家，我在網站載明的時間去到

那家餐廳，卻沒有例會。他們可能電話號碼也不正確，有時候他們一個星期或一個月才看一次電子郵件。因此，現在我會試著用臉書來聯繫扶輪社。這樣比較快。

去年，我加入國際旅遊及接待聯誼會。我們的會員超過 1,000 人，我們彼此接待。有時候我們只是去機場接人，或是碰個面介紹當地的景點、食物，及文化。這是和許多不同扶輪社員連結的好方法。

扶輪是一個大家庭。我記得瓜地馬拉有一位扶輪社員幫助我取得尼加拉瓜的簽證。尼加拉瓜大使館告知我我無法取得 14 天的簽證。我打電話

給該扶輪社員，他用西班牙文跟官員談。不到一小時後我就拿到簽證。

在聖地牙哥，我遇見的一位扶輪社員告訴我我瘋了，我不能從陸路到巴西。那花了我三個半月，可是我辦到了。我抵達時發給他一封電子郵件。

口述由 Diana Schoberg 整理

參加國際旅遊及
接待聯誼會再上路。
詳情請見 lthf.org。

透過扶輪墜入愛河

潔西卡 Jessica 與吉姆·艾伊羅 Jim Aiello

美國賓州哈理斯堡 - 基斯東 (Harrisburg-Keystone) 扶輪社

吉姆：我在 2012 年獲選加入團體研究交換小組。哈理斯堡 - 基斯東扶輪社贊助我，所以我想我該前往致謝。潔西卡是社長。我坐下來，心想：「這個女人真漂亮。我得再來。」

潔西卡：他去蘇格蘭，回來後我們成為朋友。前幾年，我們兩個斷斷續續都曾和不同的人交往。當那些關係結束時，我們會坐下來一起喝啤酒，抱怨約會壓力好大。同時，我們扶輪社裡的一個共同朋友就在旁敲邊鼓說：「吉姆怎樣？潔西卡如何？為什麼不試著發展看看？」

吉姆：我們扶輪社的社員有一股暗流在撮合我們兩個。我的態度是：「哇！她好漂亮。」我喜歡跟她在一起，但我不想破壞友誼。

潔西卡：我在維吉尼亞州找到個很好的工作，所以我決定去。當我在準備搬家時，我和吉姆越來越常共處。我開始瞭解到：「這個人是個很棒的朋友，可是我想我們應該可以進一步發展。」



吉姆：一杯紅酒成為轉捩點。

潔西卡：有天晚上我們共進晚餐，最後接吻。起初我說：「咱們冷靜一下，我想要先在佛瑞德里克堡安頓好。」可是不過幾天沒跟他講到話，我就好想他。這促使我們決定嘗試遠距離關係。

吉姆：在她搬家前一週，我們參加一場扶輪派對，我跟她說：「我要在大家面前親妳。」

潔西卡：那多少算是突破了曖昧。我們長距離戀愛近兩年，最後我搬回哈理斯堡。在本社的每場例會，社員可以給糾察一個「開心美元」，然後可獲得 15 秒的講話時間。因此吉姆給了開心美元後說：「我向潔西卡求婚，她答應了。」

吉姆：我們的婚禮牧師把超我服務融入演說中，當場約有 20 名扶輪社員。

潔西卡：扶輪強化我們的關係，因為我們可以一起到食物銀行做義工或撿拾垃圾——採取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行動。我一直想要與跟我一樣關懷別人的人在一起，我確實在吉姆身上找到這些特質。

如果我遇見我認為適合某個扶輪社友的人，我會勇於說：「嘿，你想不想跟這個人一起喝點東西？」目前我們還沒撮合任何人訂婚，可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吉姆：年底前我們會促成一對。我有感覺。

口述由 Anne Ford 整理



獨自駕機繞行地球

拉維·班薩爾 Ravi Bansal

美國紐約州水牛城 (Buffalo) 扶輪社

幾年前，我的小姨子死於癌症。我想要找方法提高對這個疾病的認識，並為我家鄉的慈善醫院募款，所以我想到開飛機環繞世界一周。這對我來說是個很遠大的計畫，就像是爬上聖母峰一樣——只不過有4千多人成功攀登聖母峰，500多人曾進入太空，卻只有126人曾單獨駕機繞行世界一周，而我是唯一這麼做過有印第安血統的人。

這麼困難的部份原因在後勤補給。我在六週之內飛過2萬6,000英里，每趟旅程我都必須取得無數文件、辦理通關手續及保險。單引擎的飛機若發生問題，如果你在陸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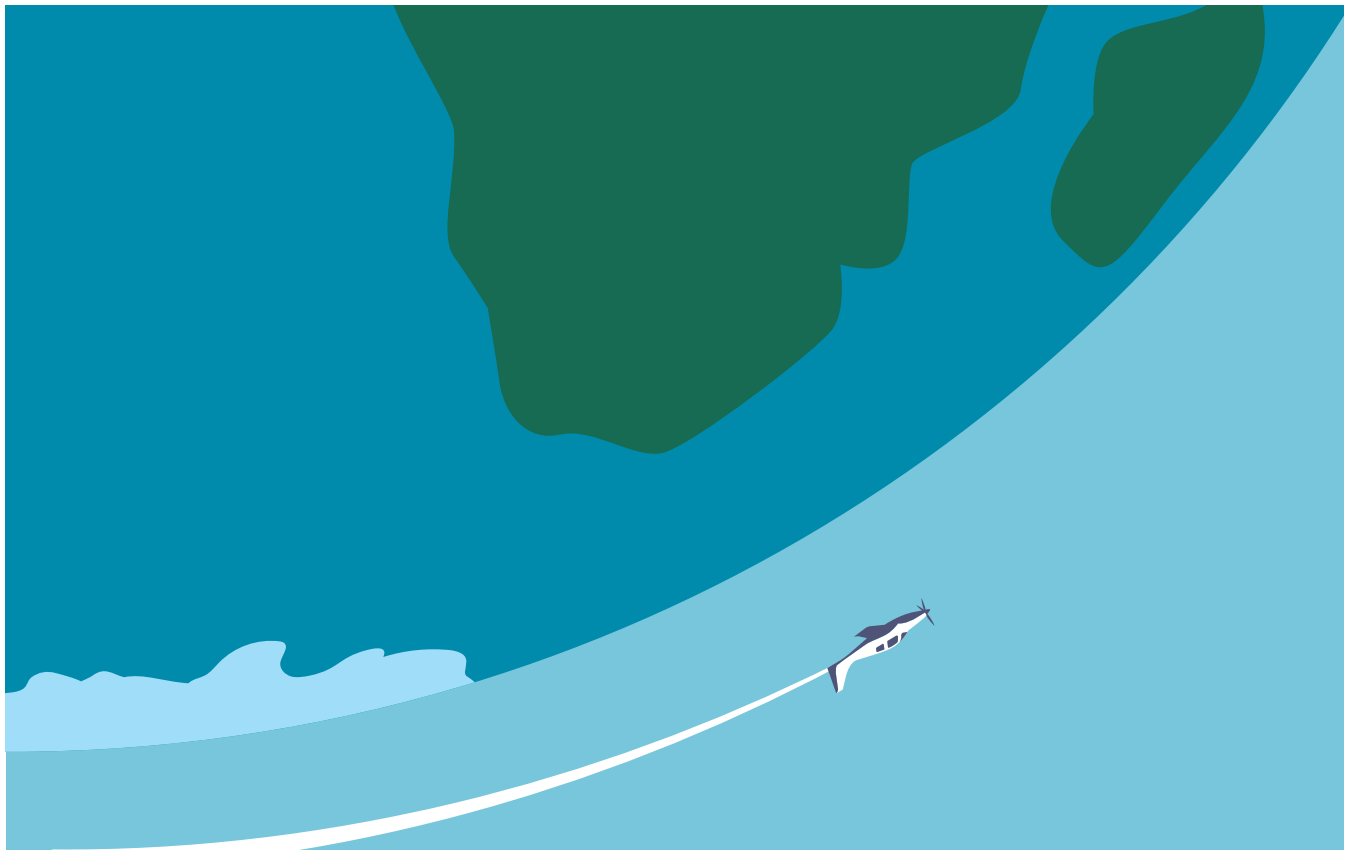
空，通常可以安全降落在道路或田野上。可是當你繞地球一圈，有70%的時間都是飛行在水面上。

我的旅程最可怕的部份是從加拿大的拉布拉多，橫越北大西洋飛到格陵蘭。那是我第一次飛越海洋，啟程後不久我的衛星導航就故障。後來我發現這種情形經常發生在高緯度的時候。可是當我首次失去訊號時，我嚇壞了。我往下看，極目所見都是冰山——數百萬個冰山。我想：「我在哪裡？我往哪裡飛？」我的衛星導航故障了兩分多鐘，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那兩分鐘就像兩年一樣長。

身為商人，我去過許多

國家。可是我不曾去過格陵蘭。當我終於抵達該地，我可以看到結冰的雄偉山脈以及細小的跑道，那是在這趟旅程中見過最美麗的時刻。

另一個我永生難忘的景象是從俄羅斯的堪察加半島飛到阿拉斯加。你飛過阿留申群島時，可以看到數百個小島。因為上頭的火山，它們都是所謂的太平洋火環的一部份。你從沒看過這麼多火山過！大多數都是休火山，可是有許多是活火山，不知何時會爆發。當你搭乘商用客機飛過時，你大概在上方3萬5,000英尺處，所以你看不到它們。可是我的飛行高度是1萬英尺，有些火山只在我下方幾千英尺的地



方。我不曾去過太空，所以我不知道太空人往下看地球的感覺是如何。可是對我來說，這趟旅程讓我看到我們的地球是多麼美麗、多麼脆弱。

今天的飛行員有許多科技可以運用。我當時有一個衛星追蹤裝置記錄我的位置，所以我所有的家人及朋友都能找到我在哪裡。我多數的飛行行程中，第一個小時通常都在傳簡訊給地面上的人，讓他們知道我的狀況，並查看天氣，確認下一個機場的官員知道我要前往。

在我飛到堪察加半島之前，我讓俄羅斯的後勤人員安排運送兩桶飛行用的特殊燃料到機場。在我替飛機添加燃料

之後，一位地面官員建議我查看油桶的日期，結果那個燃料早在3年前就過期。他建議我把油從飛機裡排出來，可是我不知道我何時才能拿到新的燃料，而且在我看來燃料沒什麼問題。我決定還是要起飛。那個人要我簽一份免責聲明。下一刻我心想：「喔，天啊！我在幹嘛？」可是你必須碰碰運氣——但當然不是做蠢事。舉例來說，我知道我必須讓飛機繞行10分鐘來取得足夠的高度閃過機場旁的火山，所以我有機會確認那個燃料是否沒問題。

當我第一次提到繞行世界一周，我太太不贊成。我的孩子也不贊成。我兒子甚至不

替我架設網站。他說：「爸爸，我不要做，因為我不希望你去做！」可是他們發現我已打定主意後，就變成團隊的一份子。這是我多年來都夢想的事。現在離我完成飛行已經有一年。我此時並不想再做一次。我將近70歲了。可是我的身體狀況很好，所以一切難說。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準備好起飛了嗎？
到國際飛行扶輪社員
聯誼會的網站
(iffro.org) 規劃路線。



為 FBI 臥底

麥可·凱斯提 Michael Kesti

美國佛羅里達州培林 - 卡勒山 - 帕梅托灣

(Perrine-Cutler Ridge/Palmetto Bay) 扶輪社

在我擔任說客的生涯中，曾經一度對我所看到的貪污腐敗感到厭倦。我遇到有政客問說：「我能拿到什麼好處？」透過在政府其他機構任職的朋友，我請他幫我介紹認識一位在聯邦調查局廉政組工作的探員。我開始和他們合作在國內各地進行誘捕行動，提供如何規劃及進行的建議。

進行到某個時候，我說：「那我住的佛羅里達州南部有多少貪腐呢？」問題是他們沒有人可以臥底和他們合作。最後他們說：「我們倒是認識一位可以問看看的說客。」我問是誰，他們說：「回家照照鏡子就知道。」他們要我親自進行臥底任務！我生長在非常愛國的家庭，對國家懷有責任感，所以我並不猶豫。我知道這麼做是正確的。

我之前不曾做過他們要求我做的事——佩戴竊聽器並進行賄賂！困難的部份在於我真的必須扮演某種角色。我想最貼切的說法就是我必須成為一個演員。我必須說服那些政客我收受客戶巨款，而這

些客戶事實上是探員喬裝的。所以我必須開保時捷或其他豪華車款，並帶那些人去吃豪華大餐。我必須說這樣的話：市長，不管你要什麼，就跟我說一聲。什麼都行！」我遇過一位個市長堅持他要去拉斯維加斯找樂子。你可以想像他這麼說的意思。

設下這些圈套是需要時間的。我們必須開設假公司，並建立關係。我會說這樣的話：「這個計畫我們可以撈5萬大洋，如果你想要，其中1萬就是你的。」

有一次任務的目標起疑心，會面時帶著一名警察一起來。還有一次，一名政客回電給我說他必須退還從我這裡收受的賄款。我在想，如果我出現，會有人對我不利嗎？有一個受調查的傢伙行為言談活像是個紐澤西州的幫派分子。我跟我合作的探員說：「嗯，我想確認一下這傢伙和幫派有沒有關連，因為如果他有，我要退出任務。」

可是我不曾懷疑我有人保護。聯邦探員隨時都在監聽

竊聽器。如果我感覺不對勁，也有個暗號可以說。而且他們隨時都有探員跟在我身旁。如果我們在咖啡館碰面，他們會坐在兩個桌子外。吃晚飯時，他們可能甚至是服務生或是餐桌清理員。

當我的名字被媒體洩漏時，一切頓時亂成一團，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在做什麼，連家人都不知道。我得做很多很多解釋。我媽打電話給我說：「你要坐牢了嗎？」我說：「媽，不，不會。我是好人那邊。」

這種工作確實伴隨著風險。我和我太太都被跟蹤過。我們的輪胎曾被割破。我的車子油箱被加過糖。遊說界以及政治界的許多人都看我不順眼。可是在我看來——這很多都可以回歸到扶輪的哲學——你必須做正確的事，並挺身而出。如果你不站出來捍衛某些事，你便會隨波逐流。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道德及四大考驗都是扶輪 DNA 的一部份。扶輪社員道德委員會的網站有相關資源：
ethicsfellowship.org。

悲劇後帶來慰藉

喬治·雷比拉 George Rabiela
芝加哥 (Chicago) 扶輪社

我永遠難忘那個氣味。爆炸點的氣味很可怕。聞起來就像是把肉放在太陽底下晒好多天。

2001年，我擔任消防隊員滿25年。我不是菜鳥，可是我不曾看過911事件後在紐約所見的毀滅與殘破。

緊急應變的規模很大。來自世界各地的消防隊員湧入。最後，紐約市消防局說他們不需要更多義工——他們要找的人是帶著搜救犬的人。那就是我決定要去的時刻。當時，我正在訓練一隻名叫摩西的3歲德國牧羊犬。西南航空公司免費把我們載到紐約。當我們抵達時，警察開車送我們到爆炸點。我是在9月15日抵達那裡。那是我第一次的搜救任務，我對要經歷的事毫無心理準備。要搜尋的區域如此大，所以搜救小組分區進行。我會在一旁待命，等負責人大叫：「我們這裡需要一隻狗！」接著就是要爬過大量的碎片瓦礫。我的狗腳掌割傷，必須縫合。現場有獸醫，所以摩西包了紅白藍相間的繃帶後繼續工作。之後，開始有人送狗穿的靴子過來。

起初，我們希望我們會找到生還者，所以我們尋找

被埋在瓦礫堆中的人。狗搭配訓練師的搜尋效能，相當於30組兩人小隊。可是我們只找到屍塊。每次我們發現某人的一部份軀體，就會進行紀念儀式。

我們為手指舉辦喪禮。這令人難以承受，幾天後，我的感情耗損殆盡。

我睡在消防局的軍用床上，周圍都是受到心靈受創的男人。有這麼多消防隊員——他們的朋友——都喪生。總計有343位消防隊員殉職。在紐約時摩西是我一大慰藉。我注意到其他緊急應變人員也想要接近牠。在一片殘破中，它帶來慰藉。人們會停下腳步摸摸牠，或和牠拍照。摩西提供給爆炸點工作人員的安慰，讓我產生目前所從事之治療犬工作的構想。

現在，我有一隻名叫布雷迪的大麥町。我們隸屬一個名叫「基督工作犬」的組織。我們會去醫院、安養院、學校——任何人們需要慰藉的地方。我本來是基督教消防隊員



聯誼會的隨會牧師，在我退休後，我想要幫助他人。所以現在我開著消防車提供芝加哥旅遊——我的公司名叫「歐雷里消防車旅遊」——我用部份所得來支持我用布雷迪所進行的治療服務。2017年，我們搭機到拉斯維加斯安慰當地槍擊事件的受害者。我就是覺得我必須去。人們看到布雷迪就覺得振作。

我擔任消防隊員時目睹過許多事。我曾經把孩子從幾近燒毀的建築中救出來。我救不了一名被火車嚴重撞傷的女性。我現在仍然記得她的臉。我並沒有被診斷出創傷後症候群，可是我知道布雷迪幫助我渡過這些日子。牠天生就給人撫慰效果。我猜想那就是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的原因。

口述由 Vanessa Glavinskas 整理

在敵人砲火中前進

賀歇爾·伍迪·威廉斯 **Hershel "Woody" Williams**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密爾頓 (Milton) 扶輪社

我在西維吉尼亞州的一個酪農場長大，離任何軍事設施都很遙遠。我對戰爭一無所知。珍珠港事件發生時，我正在蒙大拿州的民間後備軍團工作。我加入海軍陸戰隊不是因為我想要打仗，而是因為我想要保護美國。我當時認為我們會待在美國，可是我很快就知道我們要前往一個我從來沒聽過的外國區域，對抗我從來沒聽過的敵人。

我在兩場戰役中對抗日本人，第一次在關島，接著在硫磺島。日本在硫磺島有1萬8,000名士兵及好幾英里的隧道。他們占盡一切優勢，所以我們上岸時，局勢非常非常嚴峻。我方士兵有好多人受傷或戰亡，連埋葬他們的地方都沒有。我的部隊順利前進到一處機場的邊緣，可是在那裡遭遇困難，因為敵人興建了許多水泥強化碉堡，他們稱之為「藥盒」。

他們在摺鉢山上揚起美國國旗時，我正在那座機場旁邊。看到國旗飛揚在山頂影響了我及島上的每位海軍陸戰隊士兵。它說——至少對我說

——我們即將獲勝，我們會攻下這座島嶼。同時，我的司令官已經失去許多陸戰隊員和大多數的軍官。我是特殊武器組唯一殘存的士兵，所以他問我可否用我的火焰噴射槍來消除一些阻擋我們的碉堡。

好吧，我可以這麼說：陸戰隊員是不會退卻的。那不是我們的做法。4小時內，用了6支火焰噴射槍，我摧毀了7座碉堡，然後我們得以前進。陸戰隊認為我的功勞足以獲得榮譽獎章，可是我不太記得事情經過，無法解釋我怎麼辦到、為何我沒有受傷、精力來自何處等等。

我心裡倒是記得一件事，我努力朝某座碉堡前進，日本人用機關槍朝我發射，子彈不斷從我背上的不鏽鋼油桶彈開來。我清楚記得這點。我記得——清清楚楚記得——的另一件事情是我試圖接近另一座碉堡時，我匍匐繞行到沒有武器的側面。那裡是覆蓋沙子的斜坡。我看到碉堡頂端冒煙出來，因此我相當確定那上頭有個開口。我爬到斜坡頂端，那裡真的有個通風管，因為日

本人在這些碉堡裡面生活煮飯。所以我把我的火焰噴射槍伸進管子裡，消滅裡頭的敵人。

還有一個非常鮮明的記憶是在我接近某座碉堡時，一群日本士兵衝出來朝我進攻。我不知道他們是子彈用盡還是判定他們一群人可以搞定我，可是我記得看著他們拿著來福槍和刺刀朝我跑來，再一次，我用了我的火焰噴射槍。因此，沒錯，這些是跟了我一輩子的記憶，它們不斷浮現腦海。我想，它們還會一直出現。

後來，在那場戰役中，我們試圖突破另外一個重兵防守的區域，我滑進一個小小的坑洞時有東西爆炸了。一片金屬插入我的左大腿。它沒有刺到血管或是骨頭。我真的很幸運。我呼喚醫務兵，他過來挖出那塊砲彈碎片，在傷口上敷了些藥——我們那時候就只有磺胺粉——幫我綁了壓力繃帶。他告訴我我應該回去醫療區休息。我說：「我不要去。我得留下來。」他對我很不高興，可是我一路上都有一大群



陸戰隊員與我同在。

我應該有充分的理由想要回家。我有美麗的未婚妻露比等著我，也渴望見到親愛的家人。每次我心中出現一絲恐懼，我就會驅除它。因為如果

你不控制你的恐懼，它就會控制你。你必須堅強。我內心一直在想的是：我辦得到。我一定能挺過。我一定能回家。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2010 年，伍迪·威廉斯
設立榮譽獎章基金會
(Medal of Honor Foundation)，
興建紀念碑向金星協會
(Gold Star) 的遺眷致意。
欲知詳情，請至 hwwmohf.org。



在政變期間對抗小兒麻痺

當時，我們忙著規劃2000年1月將在象牙海岸舉辦的扶輪社長會議。我們原本安排高階政府官員出席，可是在12月24日，一場軍事政變罷黜了總統，由古埃 Robert Guéi 將軍主掌一切。

在最初的驚慌之後，我們靜觀局勢如何演變。之後新政府宣佈它的優先事項：它取消了排定與社長會議同時期，在1月及2月舉辦的全國免疫日。我當時是國家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委員會的主委，因此那對我是很大的打擊。

我和衛生部部長商談，他告訴我政府有比舉辦全國免疫日更好的事可做。我回答說象牙海岸的兒童應該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可是沒有用。我試著向新總統陳情，可是根本見不到他。別無他法，我決定晉見新的第一夫人蘿絲·古埃 Rose Doudou Guéi。世界衛生組織免疫擴展計畫的代表

克蕾門婷·安德森 Clementine Anderson 與我一同前往。

我們認為見到第一夫人的最佳機會在一天的開始，所以我們早上9時就出現在總統府大門口。一名衛兵問我們有沒有預約。我們沒有。他認為我們是兩個瘋女人。我們不在乎。我們沒有退縮，就坐在哨兵崗附近的椅子上直到我們終於被召喚到裡面，再度解釋我們來訪的目的。

大約在下午3時半，我們被帶到一間客廳與第一夫人的禮賓長見面。再一次，我們必須解釋我們的目的。終於，古埃女士同意接見我們。我告訴她：「第一夫人，您是位妻子，也是位母親。您知道辦理這些全國免疫日有多重要。」她回答：「可是我能做什麼？」我們請她和丈夫談談，提醒她女性在我們國家擁有的說服力——事實上，我們的國王常常與妻子共同商議大事。

瑪麗 - 愛琳 · 李奇蒙 - 阿胡瓦 MARIE-IRENE RICHMOND-AHOVA

象牙海岸阿必尚 - 畢特里 (Abidjan-Bietry) 扶輪社

那個晚上她跟她丈夫談，全國免疫日重新回到政府的待辦事項中。她甚至同意親自出席。

在首都阿必尚人口最多的區域尤普根 (Yopougon) 的第一回合全國免疫日，第一夫人不克出席，可是首相賽多·迪亞拉 Seydou Diarra 出席。第二回合預計在本國北方的科霍哥 (Korhogo) 進行。我們搭乘總統專機從阿必尚起飛。我坐在第一夫人及衛生部長附近。可是飛機發生機械故障，所以我們又飛回首都換搭另一架飛機。免疫活動比預計晚幾個小時開始。在那期間，我一直擔心那些等著讓子女服用疫苗的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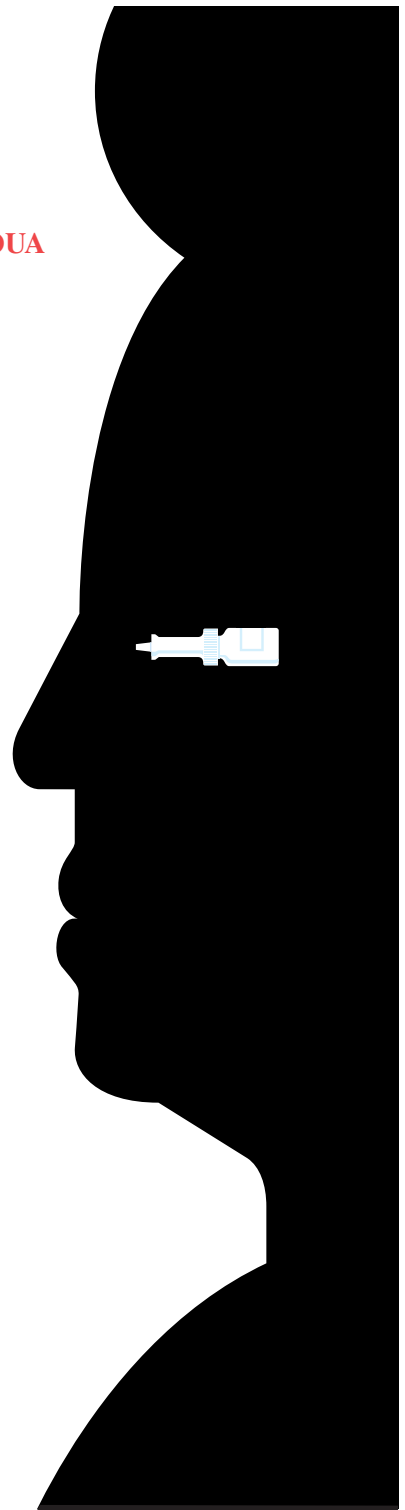
在那之後幾年，新的挑戰產生。2002 年 9 月有一次叛變，規劃的全國免疫日必須延期，同時我們與叛軍領袖協議進入他們控制的區域。2004 年 3 月發生大規模示威，抗議羅倫·加格柏 Laurent Gbagbo

的政策。我計畫在離賴比瑞亞邊境 75 英里的曼恩 (Man) 辦理全國免疫日（賴國本身也深陷內戰）。扶輪社員也紛紛打退堂鼓，表示去那裡太危險了。我說服我一個堂哥跟我一起去，我們開著裝滿旗幟、T 恤、和帽子的休旅車出發。午夜時分，我們被一名武裝士兵攔下，那是我人生中最害怕的時候。直到衛生部官員的護衛隊出現我們才確保安全。

象牙海岸在 2015 年 11 月 30 日宣佈為沒有小兒麻痺。那是在我擔任總監期間。這讓上述那些辛勞都值得了。

口述由 Alain Drouot 整理

你能怎麼做
來協助終結小兒麻痺？
請參見
myrotary.org/end-polio。



贏得奧運金牌

培林·拉芳 Perrine Laffont
法國富瓦 (Foix) 扶輪社

贏得奧運金牌是我的夢想，可是不是我的第一個夢想。在我 10 歲左右，我想要成為滑雪教練。我父親是滑雪教練，我母親是滑雪社團「歐姆斯山滑雪社」的社長。我從 2 歲開始滑雪。在法國，要成為滑雪教練，你必須專攻高山滑雪。我最愛的是貓跳——雪坡的突起小丘——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轉折。

一開始，我參加庇里牛斯山的地區貓跳滑雪比賽。我表現得很好，後來他們讓我跟大男孩一起比賽。不久，我參加全國性的比賽。2013 年，我首度參加歐洲盃，隔年，我初次在世界舞台登場。我首次參加世界盃的成績讓我取得參加在俄羅斯索契舉辦之 2014 年冬季奧運的資格。15 歲的我成為法國國家隊最年輕的隊員。我很感謝法國貓跳滑雪選手吉爾伯·科拉 Guilbaut Colas，他很照顧我，給我許多寶貴的建議。

住在索契的奧林匹克選手村是個很棒的體驗。它的感覺像是位於斜坡底部的山區小村莊。得以認識其他運動的選手是很棒的一件事。我晉級決賽，但最後只得到 14 名。我



不開心，但這只是激發我力圖更進步。

在索契之後，我的滑雪生涯開始對我父母造成財務重擔。我父母的朋友，扶輪社員阿諾德·霍賽德 Arnaud Hoscheid 從我開始比全國賽後就一直留意我的進展。2014 年初，他說服他所屬的富瓦扶輪社提供我大力且實質的支持，那有助於我在接下來 4 年準備參加韓國的平昌奧運。從那時候起，我也獲得其他贊助者，讓富瓦扶輪社現在可以資助更有價值的目標——例如幫助兒童接受教育——也更符合該組織的價值觀。

2017 年，我在世界盃中奪冠，可是我最終的目標依然未達成。隔年的平昌奧運，除了我父母外，我的祖父母也來看比賽，益發激勵我的士氣。

這一次，我感受到壓力，因為我是備受看好的選手之一。我的教練幫助我克服壓

力，要我專注於在斜坡上求勝所要做的事，而不是過度執著於結果。壓力也可以是好事，推動你追求最好。

我在女子貓跳滑雪最後一次出賽結束後，屏氣凝神等著宣佈成績。還有 2 名選手未比賽，我希望她們的表現不會超越我。最後，我擊敗在索契奪冠的加拿大選手潔斯汀·杜佛-拉朋 Justine Dufour-Lapointe。站上頒獎台，我瞭解到我的夢想成真。現在我的動力是在 2022 年北京冬奧衛冕。而我還想獲得一個頭銜：世界冠軍。我想要那個水晶盃——國際滑雪聯盟頒發的獎盃。2 月美國猶他州的 2019 年世界滑雪錦標賽請留意我的身影。

口述由 Alain Drouot 整理

不是奧運冠軍也可以加入
國際扶輪社員滑雪聯誼會！
詳情請見 isfrski.org。

在阿富汗興建曲棍球場

薩米娜·尼克賽 Zarmina Nekzai

加拿大安大略省北約克 (North York) 扶輪社

2016年，我到阿富汗北部巴查卡地區參觀一所女子學校。有些學生拿幾顆球到戶外，在校園四處跑來跑去，一邊玩一邊大笑。她們讓我想起我兒子和同儕在加拿大玩曲棍球的模樣。他在我們以難民身分抵達加國後不久出生。

在阿富汗，我曾經擔任成人識字教師以及成人教育計畫的主管。1981年，我在從喀布爾出發的巴士上，被古勒卜丁伊斯蘭黨的恐怖份子挾持為人質。我們有19個人，都是教師，都是女性。在隔天軍方來解救我們之前，我們有3個人被殺。

1984年，一顆火箭砲擊中我家。我父親喪生，母親及3名手足身受重傷。我心碎了。我知道我們

不能留在阿富汗。我和丈夫帶著3個月大的女兒離開。我們去巴基斯坦，後來和所有家人失去連絡。3年後，發現我姑姑已經移民到加拿大；我們在1988年12月搬到該地。在我們抵達4天後，我兒子出生。

在來到加拿大之前，我

從沒聽過曲棍球。我讀高中時有打排球。可是曲棍球是加拿大的國球，我想要把它引進阿富汗。

我也想要提供安全的地方讓女孩從事運動。在巴查卡女子學校有一個巨大的校園空



地，這似乎是興建曲棍球場的機會。在阿富汗，北部天氣冷，可是大多數的孩子都沒聽說過曲棍球，也沒看過曲棍球比賽。

2017年，在北約克扶輪社的支持下，我們開始興建球場。我們在中央做了排水管，

以便溫暖季節時可以當曲棍球、籃球、排球，及直排輪的場地。

球場在2018年年初竣工，我前往阿富汗，到海關領取設備。開始報名時，多達500個孩子湧現，可是我只有

50人份的制服和裝備。我開始在教室教這項運動。學生都非常興奮。然後她們做直排輪練習，並試穿裝備。

我們有兩隊，每隊各25名學生。巴查卡地區的女性曲棍球選手比例當然是阿富汗最高。可是她們的熱忱促使我做更遠大的思考。我的夢想是讓阿富汗參加奧運曲棍球賽。我想要贊助一支

阿富汗女子隊到加拿大來。讓她們接受訓練，然後回阿富汗後教導另外一群人，然後再傳承下去，直到曲棍球推廣到阿富汗各地。

口述由 Frank Bures 整理

在邊境為移民家庭而戰

我從新聞聽說兒童與家人被拆散，遭遇和其他人一樣。那是在6月中旬，有關家庭在美墨邊境被拆散的報導開始湧現，當時我正好出席舊金山的移民律師會議。

我有一個五歲和一個七歲的孩子，我能想到的是：如果這些是我的孩子該怎麼辦？

我的母親出生在墨西哥的美國傳教士家庭，我在墨西哥、德克薩斯州和密蘇里州等地長大。後來，我在比利時擔任扶輪青年交換學生，在西班牙巴塞隆納擔任大使獎學金學生。

此前，我曾在位於德克薩斯州哈林根 Harlingen 附近，靠近邊境的伊莎貝爾港 Port Isabel 拘留所承辦一件無償庇護案。儘管困難重重，我贏了這個案子，一個四口之家，包括一個懷孕的媽媽，獲得釋放。假使我在5月開始實行零容忍政策之後就接受了他們這一家的案子，那麼他們的故事就會大不相同。

因為我熟悉各拘留所、

在移民和庇護法方面經驗豐富，而且會講西班牙語，所以我覺得有必要提供幫助。我買了一張機票，然後飛到邊境，去見那些還沒有見到律師的父母親，我希望在48小時內見越多人越好。

我在6月26日星期二進入伊莎貝爾港。這個港位於德克薩斯州一個非常偏遠的地方。抵達後，你必須交出所有個人物品——包括手機。我被要求脫掉身上的珠寶首飾。這是一個新規則；聽說有人試圖在他們的首飾中隱藏錄音設備。然後我在有人陪同下去見那些被拘留的人。這裡基本上是一座監獄。一名警衛帶我走過幾道他也沒法開的門。有人在攝影機上看到我們，然後再按開關打開門。

那天我是那裡唯一的志工移民律師。我與4位母親及7位父親交談，他們當中有的是第一次對外人講起他們的遭遇。有些人不禁哭了起來。儘管開始讓家人團聚的行政命令已於6月20日公佈，但許多

家長還未與孩子談過話。

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們的孩子在哪裡。我只能與每個人談大約30到45分鐘，所以我設法了解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為什麼要盡快尋求庇護。然後，我會就如何為「迫害恐懼可信度」訪談做準備以及在此過程中會發生什麼，提出建議。面對著一位被強行與她五個月大的嬰兒分開，憂心如焚的母親，我也流淚了。那時她還在哺乳。

我已經在移民法方面執業10年，我希望人們了解這些家庭。我遇到許多父母逃到美國，為的是讓他們的孩子能到更安全的地方。他們逃離家庭暴力、幫派暴力或政治迫害。我見過的一個女人目睹了一起謀殺案。當她向警方報案時，他們告訴她，她不應該這樣做，因為現在兇手會來找她。

我遇到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會與孩子分開。零容忍政策從5月開始。雖然這些家庭之前被拘留過，但他們都是被關

露碧·包爾斯
RUBY L. POWERS L.
休士頓網路扶輪社

在一起。但是，有一條法律規定在家庭拘留期間兒童不得被關押超過 20 天。因此，如果他們沒有在入境口岸過境，為了迴避這一要求，美國政府開始指控父母非法入境，然後將父母與孩子分開。該政策自大約 5 月初至 6 月 20 日生效。

我把這看成像帶來混亂和附帶損害的海嘯。起初，家人們是分開的，無法互相交談。現在，大多數人已經離開拘留所並團聚，但有些父母已經在沒帶著孩子的情況下被驅逐出境，或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放棄了團聚權利。這還沒有結束。我們哪裡會知道未來幾年的損害會帶來多麼大的影響。

我認為這是人道問題，而非政治問題。自從我在高中加入扶輪少年服務團以來，我一直留在扶輪，而這正是這個組織教給我的——關心人道問題。這就是扶輪社員們關心的：其他人，所有人。

口述由 Vanessa Glavinskas 整理



穿越秘魯沙漠 156 英里

布萊恩·克羅瑟斯 BRIEN CROTHERS，
凱西·李·克羅瑟斯 Kathy Lee Crothers 的丈夫
加利福尼亞州米德爾頓 Middletown 扶輪社

我一直到差不多 40 歲才開始跑超級馬拉松。一位高中的老朋友介紹我去跑的。當時我想，「一定要跑跑看」。凡是超過 26.2 英里的馬拉松都叫超級馬拉松。它可能是 30 英里，可能是 50 英里或 100 英里。這些距離我都跑過。

2014 年，我參加了撒哈拉沙漠馬拉松 Marathon des Sables，這是一場在摩洛哥進行為期七天的六階段馬拉松賽。我參加過全天候的比賽，衝-衝-衝。但是在階段賽中，只要你在合理的時間內跑完路程，你就有時間在晚上休息。

後來我聽說 2017 年預定在秘魯舉行撒哈拉沙漠馬拉松衍生賽。我太太是米德爾頓扶輪社的社長當選人，我們正在與我們的一些扶輪社員好友談話。我們突然想到一個點子：把這個比賽作為募款活動。我常說，在超級比賽中，第一英里和最後一英里是最難的。因此，我們決定將我們的募款活動稱為「根除小兒麻痺的最後一英里」，因為我們正處於根

除小兒麻痺的最後一英里。我們到加利福尼亞州各扶輪社及扶輪青年服務團做簡報，籌募了 81,300 美元。

比賽是在伊薩沙漠 Ica Desert 舉行，靠近納斯卡 Nazca，就是納斯卡線所在地。比賽從早上 8 點開始，我們揹著背包跑——我的背包裡有一個墊子、一個睡袋、晚上穿的東西、一週的食物、指南針，以及他們發的地圖冊。每隔 6 或 8 英里就有一個檢查站，可在那裏取水。

第一天約 23 英里。在秘魯，沙子真的是粉粉的，塵土飛揚，因此摩擦力不好。這條路線下到乾涸的河床，真的非常、非常熱。有一個曾在摩洛哥和我一起跑的人因為嚴重脫水而退出。第二天的路程是馬拉松的距離。我預期會吃苦頭，但我認為這是我最好的一天。一切都對我有點友善。你知道是怎麼回事。有些日子很好，有些就沒那麼好。

然後是另一個 26 英里的階段，接著是一段長的，43

英里。那天，我們起得很晚，晚上才跑完——這是這次冒險的一部分。所以那個路程有一半，我是在黑暗中靠頭燈照明下跑的。有一段時間，逆風時速為 25 英里／小時。幾乎沒法跑，所以我逆著風向前走。這樣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那一段結束於海灘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是一個綿延數英里的美麗海灘。第二天我們休息了一天，去泡在海裡真的很不錯。他們還帶來了一輛裝滿冰可口可樂的敞篷小貨車。

接下來一段沿著海岸，也是馬拉松距離，最後一天很短，12 英里。終點線位於一條泥土路盡頭的懸崖上。我的目標是跑入前 100 名，最後我得了第 97 名。不知何故，我最終還成為第一個抵達終點的美國人。

最後一幕有點令人感動。當我越過終點線時，我知道他們正在直播，我想我在跑最後幾英里時得到了某種啟發，因為我走到鏡頭前指著我的袖子上的字「立刻終結小兒麻痺」。

口述由 Frank Bures 整理



請協助根除小兒麻痺
越過終點線。
請到 endpolio.org 捐獻。



以每小時 183.9 英里的速度騎自行車

丹尼斯·穆勒·柯瑞尼克 DENISE MUELLER-KORENEK

加利福尼亞州蘭喬聖菲 Rancho Santa Fe 扶輪社

我 14 歲的時候開始參加自行車比賽，前後五年。在那之後，我當了家庭主婦，並開始我的職業生涯。2009 年，我開始參加馬拉松訓練，彷彿我的運動細胞一下子醒過來。我跳回自行車上，去找我的自行車比賽教練約翰霍華德 John Howard。他提到沒有女人曾試過打破自行車陸地速度記錄。我決定以那個由弗瑞德·隆匹柏格 Fred Rompelberg 持有的記錄，每小時 166.9 英里為目標。在 2018 年 9 月，我創造了每小時 183.932 英里的記錄。

要達到這個速度，首先要被汽車拖行到一定的速度。我用的自行車是帶有巨大齒輪的單齒輪自行車——踏一次踏板可把你往前帶 138.5 英尺。踏踏板需要很大的力氣。所以你不能一跳上去就開始騎。

我把一根能承受極大張力的電纜繫在汽車後面。我有一個槓桿，可以讓我在準備好時被釋放。在每小時 110 英里的速度下，我從拖車上鬆開並踩自行車踏板，加速，在拖車所產生的氣泡中騎車。

當我的司機加快速度時，我就衝跑到泡泡的後面，當時我很用力踩踏板。自行車後面的一股空氣告訴我，我正處於那個漩渦的後面。如果我在泡沫中騎得太前面，我的車把會碰到拖車後部的帶襯墊的防撞桿，來警告我有危險。

你的腎上腺素大量上升。就像坐你喜歡的雲霄飛車一樣，你一遍又一遍地騎自行車。你感覺到時間感已經變了。我騎得越快，一切似乎都發生得越慢。在鹽灘上，沒有樹木，柱子或停放的汽車可以作為速度的參考點。陸地上

只有白鹽，所以你失去了速度感。

當你那麼快速前進時，真的沒時間害怕。你只有時間專注於你需要處理的事情。這實際上是美事一樁，因為我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對我而言，這輩子很少遇到其他一切都放慢而且基本上停止的情況。你可以專注於一件事，幾乎就像是處於涅槃中。達到絕對清晰的那一刻實在令人振奮。一旦我完成而且我們成功了，我感覺就像，好吧，讓我們重新排隊再做一次！

口述由 Nikki Kallio 整理

無論你騎得快還是慢，你都可以和扶輪一起騎自行車。請至 cyclingtoserve.org，參加騎自行車服務國際聯誼會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Cycling to Serve。

與梅杜莎同游

凱倫·奇恩伯格 KAREN KIENBERGER

扶輪學生

水總是圍繞著我。我在瑞士日內瓦湖北岸的洛桑（Lausanne）出生。我們每次搬家，最後都還是住在湖邊。我第一次看到海的時候才3歲，當時我們全家去科西嘉島（Corsica）度假。我爸媽打定主意，與其帶著我和弟弟去滑雪度假，還不如帶著我們去海邊脫光光玩水比較省事。

在我6歲時，我們到印度洋的模里西斯（Mauritius）租了間海邊小屋。當時我看到海星和海膽，還跟著漁民出海，看著他們回收捕蝦簍。我總是有問不完的問題：這是什麼？那是什麼？可以說，我的生活總是離不開海洋。

2008年，我到宏都拉斯外海的加勒比海海域潛水，生平第一次見到水母。我一直覺得它們好美。它們真的被誤解了。它們因為會螫人而惹人厭，但卻是海洋生命的重要成員。雖然沒有脊椎、心臟或腦，它們卻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約5億4,000萬年，甚至比恐龍還早。

「水母」（jellyfish）這個名字也是大錯特錯。它們跟「果凍」（jelly）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也不是魚。它們被歸類為膠狀有機體。「膠狀」？我們也太執著於那個詞了。

水母的法文是 méduse，西班牙文則是 medusa。在神話故事中，梅杜莎可以把人石化。我們都忘了，她曾是美麗的女孩。

在海底觀賞水母，就像是去看一場沒有音樂伴奏的芭蕾舞表演。它們移動得非常緩慢，所以你有的是時間近距離觀察它們。看著它們的收縮律動，會讓人入迷。它們看起來就像是海裡的舞者。

我在西班牙加的斯大學（University of Cádiz）攻讀海洋科學及海洋學，取得了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但我說，除非讓我愛上某個主題，我才會去拿博士學位。到了暑假時，我開著一輛嬉皮車在西班牙四處閒晃，還跑到地中海潛水。我看見一些水母，卻發現沒有太多相關資訊。我發現我真的迷上它們了。我戀愛了。

但當時西班牙的經濟狀況一塌糊塗。我的指導教授告訴我：「我們無法為你的博士研究提供任何經費補助。」這一點都沒讓我打退堂鼓。我覺得我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錢。我還很年輕，充滿幻想。

回到瑞士後，我寫信給超過150個基金會。這些都是手寫信，不是電子郵件。我收到的回應是：我們無法提供任

何補助。不、不、不、不。什麼都沒有。

但瑞士某間大學的一位秘書還記得我，發了封電子郵件給我，說是日內瓦湖扶輪社（RC Genève-Lac）願意提供一筆獎助金，資助一位瑞士籍學生出國進修。我接受了面談，向社員們說明我的研究內容。他們說：「我們願意資助妳。」他們為我排除萬難，幫我爭取到一筆地區獎助金。我也獲得日內瓦國際扶輪社（RC Genève International）的協助。扶輪總是支持著我。少了扶輪，我不會有現在的成果。

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種又大又美的白色水母「Rhizostoma luteum」。我被她深深吸引著，她就是我的寶貝。她的相關記載最早出現在1827年，但過去60年來，沒有任何針對我的水母所進行的研究。有些科學家甚至認為她不曾存在過。

後來，有些奇怪的水母開始被沖上西班牙的海岸。那在當時是件大事：地中海出現新的水母物種。我在海灘上擺了個攤位並張貼一張海報。我會和潛水客聊天，問問他們有什麼發現。

後來，我察覺到一件奇

怪的事。我有一本潛水指南，裡頭沒有任何有關這種新水母的照片，但封面的照片卻是一隻有著長長「觸手」的白水母。原來潛水客早就拍下它的照片但卻認錯了。他們稱呼它為「桶水母」（*Rhizostoma pulmo*），那是另一種又大又白的水母，但多了個藍色的環。我告訴自己：一定是哪裡搞錯了。

我用電子郵件聯繫上潛水客、攝影師和潛水用品店。一開始，沒多少人回信。經過兩年，我透過臉書漸漸打開知名度，也開始有越來越多人寄照片給我。我這才能夠證明這種「新的」水母就是我所說的「*Rhizostoma luteum*」。

現在，我正與維也納動物園（Vienna Zoo）合作，運用圈養的方式飼育這些水母。最近，我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頭一次記載了這種水母的生命週期。在 21 世紀，我們居然還能找到一種生命週期從未被記錄下來的動物，真是太驚人了。

目前，我正在瓦萊州（Valais），鄰近馬特峰的爸



媽家撰寫博士論文。我靜靜地寫著，望著窗外的阿爾卑斯山。這裡沒有湖泊。這是我這輩子難得沒看到海水的時候——但我的心永遠與海同在，也關心著她的未來。

口述由 **Geoffrey Johnson** 整理

扶輪社及地區可以透過扶輪基金會贊助獎學金，提供研究所學生出國進修教育或扶輪其他任何焦點領域的學科，也可以運用地區獎助金來資助大學生或研究生。請造訪 rotary.org/scholarships 以瞭解詳情。



撫平戰爭的傷口

賴瑞·錢伯斯

LARRY CHAMBERS

柬埔寨金邊扶輪社

(RC Phnom Penh)

從 1969 年到 1970 年間，我跟著美軍 101 空降師的「lurps」在越南阿紹谷（A Shau Valley）打越戰。其實是「LRRPS」：也就是「遠程偵察巡邏隊」。我在自己的幾本書中都提過那段經歷，在這裡就不贅述了。這樣說吧，美軍最危險的任務之一是深入敵後蒐集情報。

而我就是其中一名幸運兒。我平安歸來，在猶他大學取得了學士及碩士學位，之後股票經紀人和作家的事業也做得有聲有色。

2008 年，金融市場崩盤。原本，我光是幫金融證券業代筆寫作，一年就能賺進約 40 萬美元。直到有一天，我賠了兩筆共同基金，我撰稿的雜誌也轉為數位化。一夕之間，我的收入全沒了。

有時，人就是要等到失去一切後才會頓悟。扶輪的座右銘是「超我服務」(Service Above Self)。我發現我的居然相反：我超服務(Self Above Service)。那才是我的信念。但我的財務危機演變成一場個人危機。

當情緒跌到谷底時，我問了一位治療師的朋友：「你在沮喪時都怎麼辦？」他說：「幫助別人啊，比你更悲慘的人。」我說：「我不知道還有誰比我更悲慘啊！」然後我心想：「我要去泰國幫助瀕危的大象。」

當時，我依舊為越戰百般辯解。如果你遇到越戰老兵，你光說出「越南」，他們就會說：「你根本什麼都不懂！我去過，你沒有！」但在泰國清邁，我認識了一位加拿大的歷史學教授。她問我有沒有看過勞勃·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的訪談紀錄片《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她問我，對這位聲稱越戰是個可怕錯誤的前美國國防部長有什麼評價？

平常的話，我早就開罵了，但這次我沒有。這次我只是聽，然後搖搖頭。她接著說：「你知道的，這裡距離河

內不是那麼遠。或許你應該走一趟，親眼瞧瞧。」

我心想：「我會證明給妳看！我會去，然後證明我才是對的。」我去到河內，接下來一個月走遍了越南各地。

重回越南，讓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越南人——他們有著幸福的家庭和可愛的孩子，不是令人恐懼的萬惡敵人。我的結論是：幾乎我信以為真的一切，原來都是假的。

在回泰國的途中，我在柬埔寨稍事停留。越戰結束後，赤柬最高領導人波布(Pol Pot)的軍隊殘殺了約200萬柬埔寨人。在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裡面有一棵「殺戮之樹」(Chankiri)，當時赤柬軍人就是把嬰兒活活砸死在這顆樹上。我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然後眼淚開始滑落。這棵樹難以置信地打動了我。

我所經歷的，就是佛家所謂的「自他交換」(tonglen)——對他人的憐憫之心油然而生，無論他人曾經多麼冷酷。為了真正感受對他人的憐憫，你必須先憐憫自己。

接著我發現，原來這也

是我的共業。是我的政府轟炸了這個國家，逼它走上絕路。我這才心想：「我剛剛發現比我還悲慘的人了，就是曾歷經這一切的人。」

過沒多久，我坐在金邊一家餐廳裡，認識了一位帶著4個小孩的離婚婦女。我告訴她：「妳不會明白為什麼，但我要照顧妳們一家人。」我支付了她小孩的學費。然後我開了一家出版社，專門出版英文及柬埔寨文的童書。我開始了更多的計畫，自掏腰包花了一堆錢，卻又似乎毫無進展。

我回到加州探望親友時，把這一切告訴一位友人。身為扶輪社員的他說：「問題在於你的計畫缺少組織架構。你真的需要加入柬埔寨的扶輪社。」

回到柬埔寨後，我參加第二場例會時就獲邀加入。突然，我成為金邊扶輪社的一員，發現扶輪原來早就有一套助人的組織架構。現在，我不再用去發想新的計畫，我已經是一支把計畫做好做滿的團隊成員。我們有10項全球獎助金計畫正在進行。柬埔寨有許多地方瘧疾及登革熱盛行，因此我們前去分發蚊帳。

而我們的旗艦計畫是與

「兒童外科中心」(Children's Surgical Center) 合作治療腦膜腦膨出 (MEC)，這是一種在東南亞以外很罕見的先天缺陷，會讓人嚴重破相。我們找到這些病童，把他們接來醫院治療，而且不向病人或家屬收取任何費用。

我最愛這項計畫的地方在於：我們回去探望時，發現他們的生活都不一樣了。而你看到這一切巨大的變化，真的是我們在 6 個月內就辦到了。一下子就還給他們一張正常的臉，他們從此能夠結婚成家，成為社區的一份子。對我而言，這是再真實不過的了：我正在伸出援手，而且看得到成果。成為扶輪社員，為我的生命賦予了新的意義和更遠大的目標。

口述由 Frank Bures 整理

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員
退伍軍人都在宣揚和平，
這是扶輪六大焦點領域之一。
請造訪 rotarianveterans.org，
進一步瞭解「扶輪社員退伍
軍人國際聯誼會」。

分享 您的 故事

這是《那是什麼感覺》(What It's Like) 第四回的年度連載，證明它深受扶輪世界內外讀者的喜愛。如果身為扶輪社員的你有個精彩的故事，或是你認識某個與扶輪有關的人有個動人的故事，

我們也想聽聽看。

敬請期待 2020 年 1 月《那是什麼感覺》第五回連載的精彩內容。

投稿分享請以電郵寄至 rotarian@rotary.org，
信件主旨請加註「What it's like」。